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述评

◎ 汪宝荣 周恩奇

内容提要: 译介与传播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其研究意义不言而喻。本文述评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展望今后的研究。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本世纪初引起国内学界积极关注。相关研究经历了“译者模式”之争、译介与传播模式初探和系统构建三个阶段,呈不断拓展深化的趋势,但目前成果尚有限,在研究广度、深度和系统性方面均有待改进。

关键词: 中国文学 译介与传播模式 译者模式 传播学 社会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1)04-0094-09

基金项目: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文化国际传播与话语策略研究中心”资助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DOI: 10.19967/j.cnki.flc.2021.04.009

Title: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Studies on Chinese-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investigat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y have a bearing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aching a world audience. This article offer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in the field. The research topic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rough Eva Hung's pioneering paper,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91.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can be identified: the heated debate on the best "translator model,"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and attempts at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such modes. Nevertheless, this topic is still largely under-researched. Hence, the authors suggest some possible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 translator model, communication studies,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uthors: Baorong W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Enqi Zh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21世纪初,提升文化软实力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国文学文化要走出去,译介和传播是必由之路。迄今,有关学者对中国文学文化译介与传播的主体(一般指译者,即谁来译)、策略(怎么译)、内容(译什么)、出版传播机制和渠道、目标受众、传播效果及困境与出路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究,尤其关注国家机构外译实践。本文所称译介,含翻译、推介双重含义。译介是一部译作得以传播的手段和过程性行为,传播既是一种手段和过程性行为,也是译介的最终目标,而传播成功又会带来对该作家更多作品的译介。由此可见,译介、传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本文主要针对译介与传播过程分析模式,所以一般不提及中国文学传播效果(接受)研究文献。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成果,但尚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刻反思。本文旨在述评该领域研究现状,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现状述评

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学界颇为关注并热烈讨论的译者模式问题,一般不涉及传播模式,所以大致属于译介模式研究。它既是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的重要基础,也可视为准备阶段。为了更清晰地呈现演进脉络,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发展进程进行述评,而不是按惯常的时间顺序来论述。根据研究对象、侧重点和性质,国内外相关论述可分为以下三方面,总体上呈不断拓展深化的趋势。

(一) 最佳“译者模式”之争

潘文国率先探讨中国典籍“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就典籍英译而言,“母语使用者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翻译涉及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具有译入语优势的未必具有译出语优势,具有表达优势的未必具有理解优势”,因此,在目前缺乏两种优势兼备的翻译人才的情况下,国人“译出”很有必要。潘文国认为,我方主动“译出”中国典籍是为了对异文化进行干预,要译介中国文学文化,不能只靠西人的“译入”,那样我们会失去弘扬中国文化的自主权;“译什么”的原则是“从大处着眼,完整地呈现本国或本民族的现象”,或把西方人忽略的那些中国典籍译介出去;至于“怎么译”,不应鼓励硬译、死译,而应要求尽量译成地道的英语,同时要“尽量减少损害中国文化的形象”(41-43)。潘文国关于本土译者应主动“译出”中国典籍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有积极意义,但他对国人“译出”的中国典籍在目标国的传播效果有所回避,导致其观点有些偏颇。

典籍英译者汪榕培原先也倾向于主张中国文学作品适合中国人翻译。他指出,“要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英国人也不见得能翻译好,中国人也不见得一定翻译不好,而在于译者的综合素质”,因此,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学作品不宜由中国人翻译的偏见“不足挂齿”^[1],不过培养高层次本土翻译人才确是当务之急(汪榕培 135-37)。但几年后,他的观点有了明显转变:“说到典籍英译,其实要翻成英语国家的人愿意看的文本,还是由英语国家的译者来翻译更好”,并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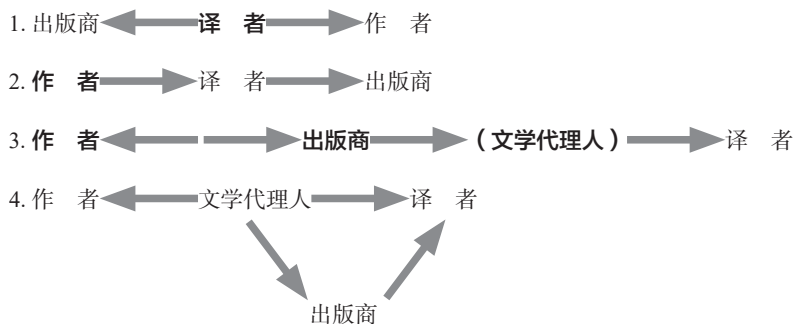
出入选《大中华文库》、由中国学者翻译的“有些译文不尽如人意”（黄新炎 55-57）。

胡安江较早提出“译者模式”概念，并基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现当代中文小说的成功案例，指出汉学家译介模式“理应成为国内翻译界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共识”（10）。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莫言获诺奖后，更是引发了关于“哪种译者模式最有效”的热烈讨论。高方、许钧指出，外国翻译家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应加强对传播途径和方式的研究”（7-8），显然是对胡文的呼应和支持。吕敏宏基于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历史与现状的梳理，指出近年来海外华裔学者译介模式“日渐衰微”，中国本土译者的译作“很难得到国外行家和读者的高度认可”，汉学家译介模式则能保证译本进入西方国家图书流通渠道（11）。许钧进一步认为，在当前国内学界争论不休的“西方汉学家模式”“中国本土译者模式”“中西合译模式”中，“较理想的是以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而非中国本土译者”（许方、许钧 74）。谢天振也认为，汉学家译介模式的效果一般好于我国国家机构“译出”模式，因为“译出”是一种“逆势”译介行为（8）。澳大利亚籍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1980—1983年在外文出版社担任专职译者，对译者译入、译出自己的母语之利弊有切身感受。杜博妮最近指出，她在外文社的一些中国同事的书面英文水平很高，但她确信“除了那些从小就说双语的人，文学翻译最好是译成译者的母语”（“The Personal Narrative” 391）。

所谓译者模式，主要关注中国文学文化谁来译、怎么译的问题，具体涉及译者的文化身份、职业素养（包括双语水平和专业知识，尤其是用目标语写作和翻译的能力）、在目标国文化生产场域所占的位置、对目标读者阅读期待及偏好的了解等。显然，就这些条件而言，西方汉学家一般更适合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翻译。目前国内学界基本上已经就此达成共识。然而，译者模式会影响翻译质量和风格，却并不直接关涉出版、传播、接受等重要环节。再者，任何规则都有例外，所谓最佳译者模式亦然。西方汉学家译介模式也有不成功的个案，例如，美国学者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几年前由一家不知名的美国小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小（汪宝荣、白亚仁 60）；其他译者模式也不乏成功个案，如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采用“中西合译模式”的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鲁迅作品。概言之，最佳译者模式之争主要关注译介端，一般不涉及出版与传播，所以大致属于译介模式研究。另有一些学者则关注翻译出版项目实施方式、过程和结果，对译介与传播模式做了初步探索。

（二）译介与传播模式的初步探索

早在1991年，时任《译丛》（*Renditions*）主编的孔慧怡就在美国学术期刊《翻译评论》（*Translation Review*）上发表论文，对中国文学翻译出版渠道做了初步探讨。她根据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参与者所起的作用，指出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出版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渠道（黑体的指项目发起人）：



▲图1 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出版渠道示意图 (Hung 39)

如上图所示,孔慧怡基于个人阅历和观察所得,厘清了四个翻译出版渠道,分别由译者发起、作者发起、作者和出版商发起、文学代理人发起,并与其他行为者交互联结,共同实施一个翻译出版项目。孔慧怡未用晦涩的理论术语,而是用了通俗说法:她把项目发起人称为“核心人物”,把其分析模式称为翻译出版渠道。孔慧怡聚焦于项目发起、翻译和出版等环节,同时关注项目参与者的交互联结,借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10-17),其结果是构建了一个行动者网络,这显然超越了译者模式研究,开创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但孔文有明显疏漏和不足:一是没有讨论国家机构外译模式,其理由是“外文出版社的体制和翻译出版政策与国外出版界迥异,因此不可能将其出版物纳入本文讨论中”(Hung 45);二是没有明确区分西方出版社的性质(商业性、非商业性),规模和类别(独立、非独立),而译作由哪类出版社出版,会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

继孔慧怡之后,杜博妮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及国外的中国文学英译主要有四种模式:学术性翻译、商业性翻译、政治目的驱动的翻译、私约型翻译(Translation Zones 2-11)。它们在项目发起人或机构、出版社、译者身份、翻译模式、出版风格、目标读者、传播与接受效果等方面往往各异:学术性翻译一般由译者发起,译作由学术出版社出版,主要面向学术受众,译文一般忠实可靠,注释较多,但出版程序繁琐复杂,图书生产成本低,普通读者几乎读不到。商业性翻译通常由译者、出版商或文学经纪人发起,译作由商业出版社出版,有关各方目标一致,即设法吸引广泛的读者。主要由政治目的驱动的翻译指国家机构实施的翻译项目,如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赞助的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也指某些西方出版社为政治目的而出书,如纽约Doubleday出版社曾翻译出版政治异见小说《北京最寒冷的冬天》(*The Coldest Winter in Peking: A Novel from Inside China*)。私约型翻译指未经第三方委托或授权、作者约请译者进行翻译,随后落实出版社,主要为了获得译作出版带来的自我满足(McDougall, *Translation Zones* 5-7)。杜博妮着重指出,外文出版社用一种非欧洲的模式运作:该社担负对外宣传的使命;采用从译者母语译成外语的非主流翻译模式;重视译文准确性,但不注重创造性;很少主动获取或考虑目标读者的反馈;图书出版发行采用内产外销模式,因此国外接受很不确定(2-11)。

杜博妮基于项目发起人或机构、出版社、译者身份、翻译模式、出版风格、译作传播与接受等变量,探讨了四种翻译出版模式,其论述比孔慧怡周到、全面,尤其对外文出版社译作模式和不同模式对译作传播效果之影响的分析,很好地弥补了孔慧怡研究之不足。令人遗憾的是,杜博妮的分类不够严谨,如为政治目的出书的国内外出版社也有商业或学术考虑,故也可归入商业性翻译或学术性翻译;其论述过于简略,且厚此薄彼,如重点探讨了外文出版社的机构译介模式,对商业性翻译语焉不详。

基于孔、杜二人的初步探索,有关学者尝试推进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马会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主要有大学出版社、商业出版社两种翻译模式:“前者销量少,但销售稳定,译作质量高;后者受市场、读者等影响,盈利菲薄,译作质量因译者能力不一而参差不齐。”(65)马会娟称之为翻译模式,但从论述内容看,她侧重探讨的其实是出版发行模式。因旨在讨论英语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该文没有涉及国家机构译介与传播模式。王颖冲参照杜博妮提出的四种翻译出版模式,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文小说英译主要有官方组织、学术引导、商业驱动、个人主持四个译介渠道,并着重探讨了之前关注不足的项目发起人(79-85)。

此外,江帆比较分析了大陆和台湾文学输出模式的运作方式和实效,指出长期以来大陆采用内产外销模式,收效普遍不佳,而台湾交由英美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英美学术圈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如此,两地的文学外译都存在与国外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因此要弱化外宣意识,加强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66-116)。

(三) 译介与传播模式的系统构建

孔慧怡、杜博妮开创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马会娟、王颖冲等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但在广度、深度或系统性方面仍有欠缺。在此背景下,有关学者尝试系统构建译介与传播模式。

鲍晓英运用谢天振的译介学理论和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的传播学理论模式,以莫言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为个案,提出一个系统的中国文学输出性译介与传播模式: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或采用中外合作翻译模式(谁来译);翻译选材上,应避免与目标国意识形态或诗学观念正面冲突,既有世界文学的普世性,又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侧重翻译现当代作品(译什么);翻译策略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怎么译);加强中外合作出版和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引入文学代理人制度,中国政府加大对国外翻译家和出版商的资助力度,等等;遵循以受众为中心原则,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科学制定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遵循传播规律,注重译介效果。该模式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而专门设计,具有较强对策性和实用性。当然,一个模式本身具有什么性质,怎么用,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本人。如果研究者采取描述性研究的路径,那么由此角度去看、去用鲍晓英的上述模式,它也具有描述和解释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鲍晓英的研究针对中国政府主

导的中国文学外译，未能深入探讨其他译介与传播模式。

不同于鲍晓英侧重对策性的模式，笔者系统构建了主要用于描述和马克法伦（John McFarlane 92）所称诊断（diagnostic）的模式：通过整合三种西方社会学理论（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从“由谁发起+由谁出版”这个运作机制入手，以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为个案，提出了七种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如下所列），着重分析了前五种模式的运作方式、特点和利弊（汪宝荣 1-6）。

第一种：海外华裔学者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如王际真英译《鲁迅小说选集》；第二种：国家外宣机构发起并资助、外文出版社出版模式，如杨宪益与戴乃迭英译鲁迅小说；第三种：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如莱尔（William Lyell）英译鲁迅小说全集；第四种：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模式，如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第五种：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并出版、招募汉学家翻译模式，如罗鹏（Carlos Rojas）、周成荫合译余华小说《兄弟》；第六种：中国作家发起、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模式，如白亚仁（Allan H. Barr）翻译余华小说《第七天》；第七种：西方商业出版社系统策划并出版、招募汉学家翻译模式，如美国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Grove/Atlantic）系统推介阎连科作品。

笔者受孔慧怡一文的启发，从“由谁发起+由谁出版”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试图对孔慧怡模式有所修正和完善。之所以强调发起人或机构的重要性，是因为发起者既是翻译出版项目的启动者，通常也是招募其他行动者的“初始行动者”；其作用相当于一台工作母机，离开了它，项目就不可能启动，更谈不上实施。与孔慧怡不同，笔者还特别强调了出版机构的重要性，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出版商是文学作品价值的“真正生产者”“作者的创造者”（*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76-77），可见出版商对译作生产、传播和认可至关重要；其二，出版社的性质、规模、类别及运作方式会直接影响文学作品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因此由谁出版对运作机制来说同等重要。布迪厄指出：“出版商很清楚一本书的成功取决于由谁出版。他们能够分辨哪些书应由他们出版，哪些书不适合他们出版，因而常常发现一本‘本该由他们出版的书’却交给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其结果往往很糟。”（*Rules of Art* 373-74）当然，除了考虑出版社类别及专业分工，更需着重考察其运作方式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效果的影响。笔者基于个案研究指出，这五种模式都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而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并出版、招募汉学家翻译模式是当前主流做法之一，其传播效果最理想（汪宝荣 6）。

二、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展望

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本世纪初以来始受重视，渐趋活跃，迄今大致经历了译者模式之争、译介与传播模式初探和系统构建三个阶段，呈不断拓

展深化之势。但总体而言，目前相关成果尚有限，且研究广度、深度和系统性均有待改进，与近年来更趋活跃的中国文学外译实践不相称。

展望本领域研究，有关学者仍将主要借用社会学、传播学、译介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但将开掘利用更多理论工具，着力构建系统性和解释力更强的译介与传播模式。以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为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另一位开创者卡隆（Michel Callon）曾提出“行动者网络运作四步骤”（203-18），迄今较少应用于翻译研究。对其略加修正，即可用于分析翻译生产和传播过程。又如，借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可尝试建构一个翻译场域结构模式，以之分析场域结构化运作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影响。

再以传播学理论及其应用为例，目前用于翻译研究最多的是拉斯韦尔经典的5W传播过程模式。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很多，其中不乏可用于描述、分析译介与传播过程与结果的模式。例如，王一多借用美国学者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六度分隔理论，提出了一个网络翻译批评模式。又如，基于英国学者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意义编码/解码政治学模型，可以建构一个“媒体翻译编码/解码模式”，以之分析新闻和媒体翻译如何受到现行制度和权力话语的影响。

概言之，可进一步挖掘利用的相关理论工具（包括中国本土理论）很多，但这些理论通常不是为翻译研究而提出的，所以要切忌生搬硬套，而应稍加修正改造，在此基础上构建译介与传播模式。但该模式是否有效，适用性和解释力如何，需要个案研究加以检验。

此外，现有研究尚需改进、深化和拓展，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迄今研究大多针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与传播，得出的结论和观点是否适用于中国古典文学或文化典籍译介与传播？后者的译介与传播模式是否有所不同？在模式相同的情况下，其效果是否有所不同？如效果不同，其原因何在？

（2）目前研究大多关注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缺乏针对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模式的研究。文化负载了民族历史、传统和精神，文化翻译需要处理好文化专有性、敏感性、禁忌、可接受性等问题，比文学翻译棘手得多。中国文化应该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哪些译介与传播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又能推动中西文化对话？

（3）不少研究属于初步探索，有待向纵深开掘。例如，当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国家机构文学外译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然而，这种译介与传播模式属于我方积极争取世界文学场域认可的输出型实践，有助于扩大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因此，不应止步于批评这种模式的弊端，而应以史为鉴，深挖其长处和潜能，探索出一种更有效的国家机构文学外译模式。

（4）国内学界逐步认识到，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是一个依靠网络运作的系统工程。一些学者做了初步探讨，例如，徐敏慧参照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认为中国严肃文学和中国通俗文学需要不同的译介模式（41-45）；张洁、刘华基于该理论，尝试分析了林语堂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模式（130-34）。近年来，这类研究有上升的趋势，但有待探索的空间很大。

如何基于系统、网络、场域等概念，建构系统性和解释力更强的中国文学文化译介与传播模式，是有待突破的又一个研究课题。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对当代中国的兴趣渐增，越来越多的西方学术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涉足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输入型模式渐盛。以汉学家为主的新一代译者和一些文学经纪人随之进入场域中。孔慧怡注意到该发展动态，撰文指出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有四个翻译出版渠道，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做了初步探索。本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出去被列为国家战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学文化译介与传播，着重探讨了译者模式，尤其是西方译者和中国本土译者谁更适合翻译中国典籍的问题。经过激烈论争，在以葛浩文等汉学家为主的译者们助推莫言获诺奖后，国内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西方汉学家总体上更适合翻译中国文学文化。译者模式之争主要关注谁来译、怎么译，一般不涉及出版传播。随后，有关学者参照孔慧怡、杜博妮的翻译出版模式，推进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近年来，又有学者借用有关理论，尝试系统构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目前看来，本领域研究仍相当不足，开掘利用更多理论工具，同时改进、深化、拓展现有研究，将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效果。

注释 [Note]

- [1] 持这种“偏见”的外国人包括英国汉学家葛瑞汉 (A. C. Graham)，他曾指出：“我们几乎不能放手让中国人去做翻译（指古典汉诗英译——引者注），因为按照惯例，翻译都从外语译成译者的母语，而不是相反，这个惯例很少有例外。”（37）潘文国正是从反驳葛瑞汉的观点入手，提出了国人有必要“译出”的主张。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o, Xiaoying.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Out: The Case of Mo Yan in English*. China Ocean UP, 2015. [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
-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Polity, 1993.
- .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Polity, 1996.
- Callon, Michel.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ohn Law, Routledge, 1986, pp. 196-223.
- Gao, Fang, and Jun Xu.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out’: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6, 2010, pp. 5-9. [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载《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5-9页。]
-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1984.
- Graham, Angus Charle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Poems of the Late T'ang*, edited by Angus Charles Graham, Penguin, 1965, pp. 13-37.
- Hall, Stuart. “Encoding/Decoding.”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et al., Routledge, 1980, pp. 117-27.
- Hu, Anjiang. “Translator Model, Translating Strategy, and the ‘Going Out’ Project to Promote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The Case of Howard Goldblatt.”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6, 2010, pp. 10-16.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载《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10-16页。]
- Huang, Xinyan. “Transl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Rongpei.”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 no. 1, 2014, pp. 54-57. [黄新炎:《翻译和中国文化——汪榕培教授访谈录》,载《东方翻译》2014年第1期,第54-57页。]
- Hung, Eva. "Blunder or Service? Th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to English." *Translation Review*, no. 36/37, 1991, pp. 39-45.
- Jiang, F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odes of Foreign-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69, 2013, pp. 66-116. [江帆:《中国大陆与台湾文学对外译介模式对比研究》,载《翻译季刊》2013年第69期,第66-116页。]
-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P, 2005.
- Lv, Minhong.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Background, Status Quo and Translation Modes." *Fiction Review*, no. 5, 2011, pp. 4-12. [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载《小说评论》2011年第5期,第4-12页。]
- Ma, Huijua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3, pp. 64-69. [马会娟:《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载《中国翻译》2013年第1期,第64-69页。]
- McDougall, Bonnie S.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Cambria, 2011.
- .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or."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ed by Chris Shei and Zhaoming Gao, Routledge, 2018, pp. 388-400.
- McFarlane, John. "Modes of Translation." *The Durham University Journal*, no. 3, 1953, pp. 77-93.
- Pan, Wenguo. "Translating into/out of One's Mother Tongue: On the Feasibility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by Native Chinese Translator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 2004, pp. 40-43. [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典籍英译的意义》,载《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第40-43页。]
- Wang, Baorong.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ode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2, 2019, pp. 1-6. [汪宝荣:《中国文学译介传播模式社会学分析》,载《上海翻译》2019年第2期,第1-6页。]
- Wang, Baorong, and Allan Barr.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Yu Hua's Works in the U.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llan H. Barr."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no. 1, 2021, pp. 59-63, 77. [汪宝荣、白亚仁:《余华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白亚仁教授访谈录》,载《东方翻译》2021年第1期,第59-63, 77页。]
- Wang, Rongpei. "Ought Native Chinese Translators not to Render Chinese Writing into Foreign Languages?" *New Explor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Hong Wang,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7, pp. 135-37. [汪榕培:《中国人不应翻译本国作品吗?》,载王宏主编《翻译研究新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135-37页。]
- Wang, Yiduo. "A Model for Internet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the Ligh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1, 2021, pp. 7-12. [王一多:《传播学视角下网络翻译批评研究》,载《上海翻译》2021年第1期,第7-12页。]
- Wang, Yingchong. "Channel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Fiction into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2, 2014, pp. 79-85. [王颖冲:《中文小说译介渠道探析》,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年第2期,第79-85页。]
- Xie, Tianzhen.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out': Problems and Their Roo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1, 2014, pp. 1-10.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载《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1-10页。]
- Xu, Fang, and Jun Xu. "Furthering Research on Foreign-Languag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riting: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4, pp. 71-75. [许方、许钧:《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许钧教授访谈录》,载《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71-75页。]
- Xu, Minhui.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Mod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6, pp. 41-45. [徐敏慧:《文化生产场域与文学译介模式》,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3期,第41-45页。]
- Zhang, Jie, and Hua Liu. "Interpreting Lin Yutang's Translation Modes in the Light of Cultural Production Field Theo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o. 2, 2018, pp. 130-34. [张洁、刘华:《文化生产场域理论下林语堂文学译介模式解读》,载《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第130-34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